

中古思想史論集



華山◎著

學苑出版社



中古思想史论集

	华 山	原著
王赓唐	华 舟	辑录
	汤可可等	审订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思想史论集/华山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77-3009-8

I. 中… II. 华… III. 思想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B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308 号

责任编辑:李 耕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02949 67678944

经 销:全国书店

印 刷 厂: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880×1230 1/32 开本

印 张:17.875

字 数:446千字

版 次: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4.80元

谨 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庞朴先生
无锡市档案局
九三学社无锡市委员会
无锡市历史学会

深致谢忱



华山肖像

目 录

第一部分 佛学

自汉魏至宋初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和道学的形成	(3)
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	(40)
隋唐佛学概说	(62)
法相宗和玄奘的唯识思想批判	(67)
华严宗思想批判	(105)
禅学小论	(124)

第二部分 宋明理学

论张载思想	(143)
程朱理学批判	(173)
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210)

第三部分 清初朴学

论王夫之思想	(225)
论王廷相思想	(261)

· 论泰州学派	(287)
从陆象山到王阳明	(325)
论叶适思想	(369)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社会政治思想	(392)
黄梨洲哲学思想剖析	(427)
论顾炎武思想	(440)
(附:沈嘉荣《论顾炎武的爱国思想 ——与华山、王赓唐两先生商榷》)	(467)
戴东原的反理学思想	(480)

第四部分 专题探讨

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一些意见	(499)
岳飞的爱国主义不能批判地继承吗?	(506)
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观点看中国历史上 的农民战争问题——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农民战争 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526)
为什么要肯定“清官”、“好官”?	(540)

附录

绝句九首	(551)
华山先生简历	(554)
华山生平年录	(556)
编后赘语(王赓唐)	(562)

第一部分 佛学

自汉魏至宋初的儒佛道 三教关系和道学的形成

道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学派名称,大约酝酿于中唐而完成于北宋中叶^[1]。它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自前期转向后期,在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新形势下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为大地主阶级服务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时也是自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思想长期斗争,长期合流的历史产物。所以我们要谈道学的形成,必须从两方面入手探索:一方面是探索其社会根源,也就是说,探索道学产生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另一方面是探索其思想源流,也就是说,探索道学形成以前三教斗争和合流的历史过程。前者属于经济史的范围,这里只简单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不作具体论证。本文主要在探讨后一个问题,旨在从三教关系史的角度来说明道学产生的必然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中古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后两期。这两期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何处,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我认为把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作为这两期的分界线是比较适合的。“安史之乱”虽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不是什么农民战争,但它的确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再编制中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这主要可以从下面几点看出来:

首先是均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到德宗时期,唐政权被迫承认了这种既成事实。杨炎两税法的颁布(公元780年)正式宣告了这一制度的死亡。从此普遍的土地私有制便获得了法律的批准,地主田庄便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这样,地主土地私有制便

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土地所有制的主导形式。

相应于土地制度的这种变化,社会阶级关系也经过了新的编组,因而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目标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均田制度的崩溃,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到处为家。这种流落异乡的农民被称为“浮客”或“客户”。他们便成为日益发展起来的土地田庄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民失去土地,从一方面说,他们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从另一方面说,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挣脱了封建国家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身奴役。当他们从国家的均田产或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转变为地主田庄的客户时,他们的直接剥削者与压迫者已经主要不是封建国家而是地主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以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关系的加强为代价的。这一依附关系的转变,决定了以后阶级斗争的新内容。在此之前,农民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封建政权,而其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挣脱或减轻人身奴役。现在,农民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政府,且指向了整个地主阶级,而他们斗争的目的,也已经变为收回被剥夺的土地或减轻地租剥削。更是由于土地兼并和商业与高利贷资本的猖狂(这三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使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显著起来。于是,“均贫富”的战斗口号便提到农民战争的历史日程上来。唐末的黄巢大起义和宋代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揭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新的一页。

“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表明农民的阶级觉悟有所提高,阶级斗争的内容比以前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了。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的出现,威胁到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当然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这迫使地主阶级不得不考虑怎样使用更有力的新的统治方式和新的精神武器来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这种新的统治方式被他们找到了,那便是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这种新的精神武器也被他们找

到了,那便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新儒学——道学。

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封建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的同时,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封建政权主要把持在豪门贵族之手。贵族庄园和部曲佃客制是他们的经济基础,而九品中正制则是他们的政治保障。当时由寒门细族出身的庶族地主虽然偶然也有个别爬到统治地位,甚至掌握中央政权的,但这毋宁说是一种例外:作为一个阶层而言,庶族地主是被排除在上层统治集团之外的,隋朝罢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度,把一向为豪门贵族所把持的选举权夺归中央,豪门贵族的政治特权受到了某些限制。及隋末农民大起义,平素奴役人民作威作福的贵族地主受到了起义农民的严厉惩罚。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势力大为削弱,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皇朝建立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相当强大的社会势力。唐政权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积极培植庶族地主,另一方面仍然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拉拢。唐政权在地主阶级的两个阶层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而在他们的联合支持之下巩固其统治。这两个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的一面。因此,他们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这种斗争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的。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豪门贵族受到了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他们的势力彻底垮台了。通过“五代”至北宋,庶族地主已把全部政权掌握到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也在庶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之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豪门贵族的垮台并没有结束地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只要封建制度存在一天,这种分裂与斗争是永远会发生的。在北宋前期大半个世纪的国内和平环境之内,社会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由于北宋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以及给予官僚地主的种种优遇,大批土地落入官僚地主手中。因此就产生了一批新的官僚大地主。这种官僚大地主虽然在社会

· 身份上不同于旧的门阀贵族,但以其经济势力而论,有的还驾于旧贵族之上。他们虽然一般也要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职,但大官僚的子弟,即使不通过考试,也可以依靠“任子制度”而得美职,这样,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差不多近于世袭。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于这班新贵族之手。然而由于北宋科举制度的发达,科举名额的扩大,也不断滋生出一批一批的新官僚。这种新官僚往往出身比较微寒,又初入仕途,与民间的联系还没有完全割断。当他们初登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利益跟旧官僚还有一定的距离。与旧官僚的经济利益的不同以及与民间的某些联系,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得到反映。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比较进步,在政治上主张改革,主张对农民作一定限度的让步,主张裁抑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比较容易倾向于唯物主义。他们的这种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势必要和代表保守的、反动的旧官僚——新贵族集团发生冲突。北宋前期的两次党争(庆历党争和熙宁党争)以及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道学的斗争,就是新旧官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冲突的历史例证。

有一种意见,仿佛道学是反对王安石的“新学”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反对学派^[2]。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上面说过,道学是酝酿于中唐而形成于北宋中叶的一个学派。当王安石变法时,道学的思想体系已基本上完成。王安石变法开始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而代表王安石“新学”的《三经新义》的颁布还在六年之后(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而这个时候北宋的几个主要道学家的年龄多半已在五十岁以上。请看下表:

周敦颐	已死
邵雍	64岁
司马光	56岁
程颢	43岁
程颐	42岁

其中二程年龄较小,也都已年过四十。他们的思想早已成熟。例如年纪最小的程颐,还在二十四岁时(公元1056年)就作过《颜子所好何学论》一篇文章,博得当时大儒胡瑗的赏识。从这篇文章看,程颐的道学思想基本上已经形成,然而这时离王安石《三经新义》的颁布还有二十年哩!怎么能说道学是为反对王安石的“新学”而建立起来的学派呢?

当然,我们说道学不是为反对王安石的“新学”而建立起来的学派,并不意味着道学不是和“新学”对抗的学派。王安石既然树立起了“新学”的旗帜,道学当然要站起来跟它反对。因为“新学”的思想倾向是和道学不同的。我们认为道学是代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它是官僚大地主用来对付日益激化、日益深化的阶级斗争,巩固封建统治的一套新的思想武器。按它的本质而言,它是主要用来反对农民,而不是用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内部敌人的。把道学和“新学”的斗争当做唯心主义思想跟唯物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是可以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道学是为反对“新学”而建立的。如果反过来说,“新学”才是为反对道学而建立的学派,或者更比较接近于事实。

什么叫“道学”?似乎从来没有人对它下过界说。尽管我们经常谈到道学,但对它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在一般人心目中,仿佛道学就是“宋学”,就是相对于汉唐章句注疏之学而谈性心理气等问题的所谓“义理之学”。这个说法显然太广泛,因为明明有些义理学家不能算是道学家。譬如王安石也谈义理,他能算道学家吗?陈亮、叶适也谈义理,他们能算道学家吗?显然不能!他们非但不是道学家,并且是反道学家!所以把道学和义理之学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另外一种看法是以《宋史·道学传》为准,凡名列《宋史·道学传》中的人物才是道学家,否则就不算。《宋史·道学传》中只有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在此四派人物之外,被列入《道学传》的只有邵雍和张栻二人。邵、张之所以被列入,

据《宋史·道学传》的序,实因他们与程、朱的密切关系。可见《宋史·道学传》只承认濂、洛、关、闽四派为道学,其他与此四派无关系或关系较疏的人物,统被列入《儒林传》,这完全出于朱熹一派的道统观,当然是不正确的。所以我认为要确定哪些人是道学家,哪些人不是道学家,首先必须给道学一个新的科学规定。

上面已经指出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现在我们从它的思想内容方面试给它一个界说:

道学,按其思想内容说,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骨干,吸取了佛、道二教的某些思想因素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目的在企图通过哲学思辨把封建伦理和封建等级制度安置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人性论的理论基石上,从而保证封建制度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它是有别于以伦理学为主的旧儒学的“新儒学”。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上,在思想的逻辑性上,在哲学概念的烦琐分析上,道学超过了我国古代哲学的任何学派。道学是严格意义的哲学,道学家也是严格意义的哲学家。

这个界说也许太啰唆一点,但界说不是定义,宁详毋略。假使我们以这个界说作为尺度来衡量宋代学者和学派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判别哪一种学说是道学,哪一种学说不是道学;谁是道学家,谁不是道学家。因此我们认为《宋史·道学传》与《儒林传》中的人物,应该加以重新鉴定。在道学中应该把张载剔出,因为“关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学派;它和代表道学的“洛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立的。至于原来在《儒林传》中若干人物,如蔡元定和三陆等,则应纳入道学。其他一些在普通列传中的人物,如司马光等,按其思想来说,也属于道学派。

我们这样把道学的界限划分清楚,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其思想线索,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个阵营混成一团。

上面提到,从思想源流说,道学是自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思想长期斗争和长期合流的产物。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自汉魏至北宋初期的三教关系史,也就是说三教之间的斗争以及“三教合一论”,或者“三教调和论”的发展史。

自汉魏至北宋的三教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四期,每期各有若干特征:第一期是两汉时期。这时期佛教初输入,道教也刚开始成立,两教势力都不薄弱,三教之间虽然已有矛盾,但尚无显著冲突。第二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三教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三教合一论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时期中,佛教有很大发展,但统治思想是玄学,佛学依附玄学而行。第三期包括隋至初唐(安史之乱前)一段时间。这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佛教思想已成为这个时期的统治思想。三教斗争不如前一时期激烈,三教调和论也很消沉。第四期是安史之乱后至北宋初期,这个时期是道学从酝酿到形成的时期。从三教关系方面说,是斗争再趋激烈的时期,同时三教调和论也高唱入云,为道学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

这是三教关系史的四个时期和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兹分别申论如下: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通过西域输入中土。最初输入时,人们只把它看做祭祀求福的一种方术,与神仙家之长生却死之术无甚区别。当时统治阶级中已有少数人信奉(如东汉初年的楚王刘英),但在社会上还没有引起多大影响。东汉后期,佛教经典输入渐多,佛教的宗教理论大致是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之说。东汉末年以后,社会入于大混乱时期。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大起义在豪门贵族和军阀的联合镇压之下失败了,从此东汉帝国陷于大分裂,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就是统治阶级的生命、财产、地位也有朝不保夕之势。这种社会政治环境正是宗教思想滋长的良好土壤。因此,

佛教很快得到广泛传播。这时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而道教也已建立。这样，社会上便同时流行着三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当然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居，势必发生斗争。这种斗争，最初是以理论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到后来才发展为政治斗争。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三教理论斗争的历史文献是牟子《理惑论》^[3]。这篇文章大致可以确认为东汉末年的作品。关于这篇文章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汤用彤氏有如下的概括论述：

汉代佛教，附庸方术，魏晋释子，雅尚老庄。牟子恰为过渡时代之人物^[4]。

《理惑论》三十七章通篇以问答体写成（以后三教争论的文章大多采取这一形式）。这里假设的“问者”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已包括了以后三教争论的主要内容。如：周公、孔子何以不言佛教的问题，沙门剃发是否毁伤父母遗体的问题，沙门不娶妻生子是否不孝的问题，人死神灭不灭的问题，以及鬼神问题、夷夏问题，等等。所以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三教大辩论的第一大历史记录。

牟子（牟融）自称对于“经传诸子书无不好之”。虽然他把佛教（他称为“佛道”）提高到“至尊”的地位，但他对孔、老还是相当尊重的，并且常“以经传理佛之说”。牟子主要攻击的是神仙派，至于孔、老的学说，他认为是各有所用的，当有人责问他“如子之言，则黄帝、尧、舜、周、孔之俦，弃而不足法也”时，他的回答是：

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余国，许由闻禅，洗耳于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在乎所用，何弃之乎？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三